

柳下惠真的能“坐怀不乱”吗？

——一个被误读千年的道德圣人及其历史本相和传说流变

□孙晓明 孙辰龙

柳下惠的生平本相探微

柳下惠（前720年—前621年），姬姓，展氏，名获，字禽，又字季，乃鲁国宗室后裔，鲁孝公五世孙。其父展无骇为鲁隐公时司空，因军功受赐以祖父公子展之字为氏，始有展氏。柳下惠一生官至鲁国“士师”，执掌刑狱，虽仅为中级官员，却以恪守周礼、道德高尚著称，成为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典范，甚至被清代学者刘逢禄誉为孔子之前鲁国唯一的“圣与仁”者。

关于他的出生，清代孔府档案中保存的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礼部批文《和圣世纪》记载甚详：柳下惠生于“周平王之五十一年（前720年），实鲁隐公三年辛酉冬十一月十八日也，降生时室有鸣响，三人惊异之。”这一日期与民国《展氏族谱》所载吻合，具有较高可信度。而其卒年，《和圣世纪》明确记为鲁文公六年（前621年）十二月三日，享寿百岁。尽管另有古籍称其九十三岁而终，但官文书的权威性使“百岁说”更为学界所接受。

其故里所在，历来众说纷纭。据《展氏族谱·世系》记载，他“生于故县，长于堰头”。故县村在今山东兖州西北，古称乘丘，春秋时即为鲁地；堰头村在其附近，虽今名始于明代，但族谱称柳下惠后人世代居此，可能借后世地名追述古事。此外，山东新泰柳里、肥城展家洼等地也有“和圣故里”之说，多系后世族人迁徙附会而成，不足为凭。历史地理学者综合判断，兖州故县一带为其真实故里的可能性最大。

柳下惠的仕途始终与“士师”一职紧密相连。《论语·微子》明确记载“柳下惠为士师”。此职在周代属司寇之下，主管诉讼刑狱，有权依法判案甚至执行刑罚，虽爵位仅为下大夫，但地位关键，可近君议事。湖北张家山汉简《柳下季为鲁君治狱》的出土，证实鲁君曾亲自听取其判案意见，并赞其“当哉”。然而，正是这样一个需要铁面无私又易得罪权贵的职位，让坚守原则的柳下惠一生坎坷。关于其是否拥有“柳下”食邑，学界多倾向否定。汉代高诱、赵岐等早期注家皆认为“柳下”为其居住地或号，唐代以后方有“食采柳下”之说，恐系后人增饰。

其墓葬所在更是扑朔迷离。河南濮阳、山东兖州高庙、新泰南汶西村等地均有“柳下惠墓”传说。兖州故赵村据族谱称为其初葬地，但可能早为空冢；新泰之墓则自明嘉靖后才见于方志，或为后世族人修建的纪念冢。真实墓址已湮没于历史，但各地遗迹恰恰反映了后人对其追思之广，祭祀之诚。

山东省新泰市宫里镇西柳村有一个文化主题公园名叫和圣园，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。这个公园占地面积108亩，以春秋时期鲁国大夫柳下惠为主题，建有和圣像、和圣湖等核心景点，形成江南园林与北方地域文化相融合的布局特色。

在中国古代贤哲的璀璨星河中，柳下惠的形象，宛如一枚独特的徽章，其上镌刻着“坐怀不乱”四个大字，历经千年传诵，几乎成为道德完人与正人君子的图腾。然而，这位备受孔孟赞誉的“和圣”，其真实的人生轨迹究竟是啥模样？那则脍炙人口的道德轶事，是铁凿的历史事实，还是后世精心构筑的伦理寓言？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，他的身影又是如何被不同时代的力量不断涂抹、重塑，乃至奉上天坛或搁置一旁？此刻，让我们拨开重重迷雾，汇集典籍的残章与民间的回响，重新踏入春秋鲁国的历史烟云，去探寻一个更为立体、复杂而真实的柳下惠，还原其生平际遇、思想内核与身后那部起伏跌宕的接受史。



新泰市和圣园内的柳下惠塑像。

从“庇护寒女”到“坐怀不乱”

“坐怀不乱”的故事，堪称柳下惠最为人熟知的道德传奇，甚至成为中华文化中“慎独”与“不欺暗室”的象征。元代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描绘得最为生动：“夫柳下惠夜宿郭门，有女子来同宿，恐其冻死，坐之于怀，至晓不为乱。”这一场景充满戏剧张力，将柳下惠的仁心与定力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然而，若追溯源头，这一故事实为后世层累建构而成，其演变轨迹清晰可辨。最早可溯至《诗经·小雅·巷伯》毛亨传。其中记载，鲁国有一男子独居，暴风雨夜邻居寡妇屋坏求宿，男子闭门不纳。寡妇隔窗质问，男子答道：“吾闻之，男子不六十不闲居。今子幼，吾亦幼，不可以纳子。”并反问：“子何不若柳下惠然？姬不逮门之女，国人不称其乱。”此处“姬”意为温暖、庇护，“不逮门之女”指无处投奔的女子。毛传仅言柳下惠曾温暖救助受冻女子而未遭非议，并无“坐怀”的具体情节，重点在于引述此事作为道德参照。

至汉代《孔子家语·好生》篇，记载略有扩充，但仍未脱离毛传的基本框架。真正将“坐怀不乱”故事丰满并定型的，是后世文人

对柳下惠人格的想象与推演。清代学者卢文弨、陈奂等曾试图从《荀子·大略》“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”一句中寻找源头，但该句原意是称颂柳下惠安于贫贱、衣着朴素与守门人无异而心志高洁，与男女之事无涉。唐代杨倞早已正确注释为“言安于贫贱，浑迹而人不知也”。可见，“坐怀不乱”的情节很可能是后人误读《荀子》文句，再结合《孟子》中“虽袒褐裸裎于我侧，尔焉能浼我哉”的比喻，逐渐敷衍附会而来。

为何此故事独独附会于柳下惠？深层原因在于其人格基底完全承载得起这一“光环”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经典早已奠定其“和悦坦荡”“直道事人”的圣贤形象。他长期仕途困顿却能“不怨不尤”，面对浊世而自信“尔焉能污我”，这种强大的人格定力与道德自信，为“坐怀不乱”的文学想象提供了坚实的人格底本。民众与文人愿意相信，也只有柳下惠这般“言中伦，行中虑”的君子，方能经得起如此极端的道德考验。因此，“坐怀不乱”虽可能非历史真实，却是其道德精神的文学化浓缩与象征，是中国人对理想人格的一种浪漫表达。

柳下惠的“三黜”人生

柳下惠的仕途充满坎坷，古

籍屡言其“三黜”。《论语·微子》直书：“柳下惠为士师，三黜。”面对他人劝其离鲁的言论，他慨然回应：“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”此话不仅体现其对现实的清醒认知，更透露出对故土的深情与原则的坚守。所谓“黜”，并非完全罢免，更多指压抑与不得升迁。终其一生，他官阶难进，抱负难展。

他的事迹散见于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等先秦文献，虽零星却光彩夺目，勾勒出一位恪守礼法、敢于直谏的贤臣风骨。公元前634年，齐军伐鲁，柳下惠授计展喜，以齐鲁先祖“世世子孙无相害”的盟誓为依据，劝退齐师，展现了以礼止战的外交智慧。当执政大夫臧文仲因海鸟“爰居”栖于城门而欲行祭祀时，柳下惠严词劝阻，系统阐明“圣王制祀”须以功德为准的原则，其言深中礼义，令文仲诚服认错。在宗庙祭祀中，他坚决反对将鲁僖公之位升于闵公之上的“逆祀”行为，捍卫了昭穆有序的礼制根本。而“岑鼎明信”一事尤为彰显其品格：齐国索要鲁国重器岑鼎，鲁君以假鼎应付，齐人指明须柳下惠作证方认。柳下惠坦言，不能以个人信誉为代价成全国君之私，终使鲁君送出真鼎。其信誉之重，竟能取信于敌国。

这些事迹共同描绘出在礼崩乐坏的时代，一位仍竭力守护周

礼价值、坚持直道、不惧权威的士大夫形象。孔子曾为其不平，批评臧文仲“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”。然而，柳下惠仕途困顿的根源或许更为深刻：他所恪守的周礼宗法，在春秋中期已渐显僵化，而鲁国新兴势力如“三桓”更重现实利益。他的坚守固然高尚，却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，其政治失意实为时势使然。

“和圣”形象的多维解析

柳下惠被后世尊为“和圣”，绝非仅因“坐怀不乱”的轶事，而是其整体人格所辐射的多维道德光芒。孟子对其推崇备至，在《万章下》与《尽心下》中多次评述，将其与伯夷、伊尹、孔子并列，称其为“圣之和者也”，并精辟概括其风范：“不羞污君，不辞小官。进不隐贤，必以其道。遗佚而不怨，厄穷而不悯。与乡人处，由由然不忍去也。”此处的“和”，并非无原则的调和，而是指其性情温和坦荡、待人宽厚，能在任何境遇中保持内心的从容与平衡。

其品格可从以下维度透视：和而不同，直道为本。他的“和”建立在“直”的基础上。待人虽宽，然与权贵论理则锋芒毕露，批评臧文仲、夏父弗忌毫不留情。他坦言“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”，明知可能碰壁仍择善固执，这是一种有风骨、有原则的“和”。

宠辱不惊，恬淡自守。屡遭压制（“三黜”），久居下位，却能“遗佚而不怨，厄穷而不悯”。他人劝离，他却安然留鲁，自信“尔为尔，我为我，虽袒褐裸裎于我侧，尔焉能浼我哉！”这般内心的定力与自足，正是道德修养臻于化境的体现。

眷恋故土，情深母邦。相较于七十余年后孔子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的灵活，柳下惠对鲁国的眷恋更为执著。他将个人仕途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，不愿为求显达而背离父母之邦，其情感成为后世爱国精神的重要源泉。

诚信立身，名重天下。“岑鼎”一事是其诚信的最佳注脚。他将个人信誉视若不可割让的“国土”，其诚信甚至能作为敌国之间的担保。其妻在诰文亦赞“夫子之诚信，与人无害兮”，可谓知夫莫若妻。

智仁兼备，知行合一。他并非空谈道德的迂儒：退齐师展现外交智慧，议祀典显示礼制深养，治狱案体现执法之能。其道德言论皆根植于具体实践与对礼制的深刻理解，故孔子赞其“言中伦，行中虑”。

正是这些复合而立体的品格，使柳下惠超越了“坐怀不乱”的单薄形象，成为一个丰满的道德典范。清代学者刘逢禄所谓“在鲁言鲁，前乎夫子而圣与仁，柳下惠一人而已”，虽言辞绝对，却道出了其在孔子之前，作为鲁文化道德标杆的独特地位。